

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在我国的早期传播及其特点

雷冰洁

中共北京市委党校（北京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

摘 要：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在我国的早期传播为二十世纪初我国教育事业发展方向何处去指明了方向。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开始传入我国，在世界教育史译著中有零星介绍。新文化运动时期工读主义等思潮的传播与试验为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早期传播做了重要的实践铺垫和理论预备。五四运动后，系统研究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的著作开始出现，为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开启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本土化实践奠定理论基础。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早期传播；五四运动；教育思潮

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在我国的早期传播是在反思旧式教育模式，与各种教育思潮相互激荡中得以深化，随着先进知识分子对教育与政治之关系的深刻把握而逐渐系统化，为二十世纪初我国教育事业发展方向何处去指明了方向。梳理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在我国早期传播历程不仅能够加强对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早期传播“并联式”过程的理解，也有助于探寻马克思主义引领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现实起点和理论需要。

一、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在我国传播的社会历史环境

十九世纪末，传统封建教育在教育思想西学东渐的浪潮之下产生了深刻变革。黄济教授将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时期文化教育领域的复杂特点总结为“反封与反帝并举，救亡与革新同行。”^[1]马克思主义及其教育思想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传入我国并得到发展的。

其一，西方以“教”变“强”的经验事实，将“教育何以强国”的问题引向中国思想理论界。鸦片战争后，中国的强国之路探索在内忧外患的局势下愈显急迫，先进知识分子从欧美和日本因“教”而“强”的经验中推动教育救国思潮的涌起。尤其是与当时的实业救国、科学救国等思潮相比，教育领域并未沉浸于各种救国方案孰重孰轻的争论，而是随即深入到教育何以强国的思考之中。这就触及到了教育与政治、教育与国家之关系这一核心议题，为理解教育的本质等问题提供了重要的理论积淀和思想先导。这是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潮传入中国的重要理论预备。

其二，后科举时代知识分子进入公共领域，为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在我国早期传播奠定舆论基础。科举制度笼罩下的教育形成了“笔传之学”的文化惯习，

文字无疑是知识传播和交流的主导载体。科举制的废除打碎了知识分子与国家的制度性关联，但也为他们整合读书人、国民、青年等身份，调整文化惯习，自觉主动进入公共领域重新寻找自身社会角色创造了重要条件。讲报、讲演、宣讲等成为后科举时代知识分子输出知识价值的新渠道，思想文化界一转重“眼学”轻“耳学”的文化传统。梁启超直呼“近数年来之中国，可谓言论时代也已矣”^[2]。这种“口语启蒙”的实践，一方面推动了知识分子了解广大基层社会民众真实生活，也激发了知识分子获取新思想、新事物的兴趣。这为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在我国早期传播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和舆论基础。

其三，近代教育体制的曲折变革，亟需摆脱封建等级社会的制度设计和理念。戊戌变法失败之后，清政府迫于压力不得不颁布一些改革措施。然而，我国家国一体的传统社会格局背后所映照出来的是植根于国人思想中对父子君臣强烈的认同感，这使得教育改革始终无法触及问题的根源。因此，即便有了新学制，1904年《奏定学堂章程》中仍提出“至于立学宗旨，无论何等学堂，均以忠孝为本，以中国经史之学为基。”^[3]再加上旧官僚窃取革命果实，使稍有好转的教育发展环境又得而复失。如此情形之下，近代知识分子在深刻反思中得出，摆脱封建等级社会理念，非使得国民精神焕然一新不可，进而推动了工读主义、新村主义、泛劳动主义等具有社会主义色彩的思潮的高涨。

二、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在我国的早期传播历程

（一）初次译介：20世纪初日本社会主义译著中的社会主义教育思想

清末民初我国掀起留日热潮之时，恰逢日本兴行

基金项目：中共北京市委党校青年项目“五四时期进步社团对马克思主义在北京早期传播的历史贡献研究”（项目编号 2024XQN002）。

社会主义学说研究之风。此时,不少留日学生开始翻译一些介绍和研究社会主义的日本书籍,其中不乏对社会主义教育思想的介绍。此后,马克思主义文献经由日本而传入中国的译介传播逐渐形成规模。1902年11月至1903年1月,《翻译世界》杂志第1—3期连载日本社会主义研究会会长村井知至的《社会主义》一书。在1902年12月第二期的《翻译世界》中,刊发了《社会主义》第五章“社会主义与教育”,初次较为系统地介绍社会主义教育主张和观点,如揭示资本家和工人受教育权利的不平等、教育增进国家精神之作用等,指出“使人人受教育,而社会道德增进,至其极盛,为太平世,则海陆军费、警察费、裁判费、监狱费,必皆大减其额。”^[4]1905年,朱执信以“势伸”为笔名在《民报》第2号上发表《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一文,介绍了“马尔克”(即马克思)以及《共产党宣言》的写作背景和历史意义,并首次完整地翻译了《共产党宣言》第二章中关于所有权、教育等问题的十大措施,指出马克思所设想的社会要“设立无学费之公立小学校,禁青年之执役于工场,使教育与生产之事为一致。(即使为生产者必受相当教育之意。)”^[5]可见,留日青年学生是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在我国早期传播的中坚力量。

(二)理论误读:世界教育史译著中对社会主义教育思想的零星介绍与误读

先进知识分子了解西方社会的热情也突出表现为广泛译介当时世界主要强国的教育史书籍,进而触及到社会主义的教育思想和主张。这是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在我国早期传播的另一个路径。1907年,中国图书公司出版的《教育史》除介绍了康德、费希特等人的教育思想之外,还介绍了一位教育改革家——派克曼(今译柏格曼,即德国的教育学家 Bergmann,P.),作者将其思想归纳为“第一,教育之目的在于养成一般社会必要之成员。第二,社会主义之意义根据于个人与社会有机之关系以调和极端个人主义与极端之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者也”^[6]等十项内容。这里,作者显然是把社会的教育学混同为了社会主义教育学。此后,研究世界教育史的书籍也多循此理。不过随着介绍马克思主义的资料日益增多,这一错误认识也逐渐澄清。如1917年中华书局出版的《新制教育史》一书,著者已经认识到“社会派之教育”与“社会党之社会主义”是“同一倾向”但“见解各别”^[7]。然而值得肯定的是,在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早期传播刚刚起步之时,我国知识分子从世界教育史的梳理中关注到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教育思想,无疑是一条独特

而又隐蔽的路径。

(三)实践铺垫:新文化运动时期工读主义教育思想的传播与实践

辛亥革命失败之后,国内社会矛盾日益尖锐,知识分子思考救亡图存的目光转移至思想文化领域。此时,包括教育思潮在内的西方新思潮纷纷涌入我国,如实用主义教育思潮、科学教育思潮、职业教育思潮、工读主义思潮与平民教育思潮等。在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影响和庚款留美学生的推动下,学界对杜威的教育理论表现出极大的热情。不过,当时昙花一现的工读主义思潮也为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的传播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工读主义起源于知识分子对清末“新教育”的反思,兴起于1918年蔡元培发表的《劳工神圣》演说。当时受到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日本小路实笃的新村主义、托尔斯泰的泛劳动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思想的影响,先进知识分子倡导通过半工半读的形式实现“新生活”,掀起了赴法勤工俭学的热潮。在法国接受思想熏陶的这些青年学生,就成为在我国试验工读主义的主要力量,其所主张的劳动与教育相结合、新村社会、与工农群众结合等客观上对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的传播和实践起到了重要的实践铺垫和理论预备作用。这可视为推动马克思主义包括其教育思想在我国传播的又一个重要渠道。

(四)关键转折:五四运动后系统研究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的著作开始出现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先进知识分子看到了社会主义思想理论的强大现实力量。此后与日俱增的对马克思主义原著和国外研究文献的翻译需求直接或间接地给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的传播提供了更多的一手资料和前沿信息。其一,李大钊、陈独秀等早期共产主义者在介绍马克思著作的同时开始有意识、有目的、有组织的总结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推动了马克思教育思想的进一步传播。其二,系统研究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的著作开始出现。1921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社会主义之意义》一书,专门介绍社会主义的教育观和儿童教育观,同年新文化编辑社出版的《现代新思想集(下册)》中还专门摘录了《共产党宣言》当中关于教育的论述。其三,一批致力于马克思教育思想研究的学者开始成长起来,如杨贤江、钱亦石、程今吾等。此外,许多知识分子也开始在《新青年》《新教育》《教育杂志》上介绍苏维埃的新教育观,把它视作马克思主义教育观的实践体现。

(五)落地生根: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开启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本土化实践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一批先进知识分子更为系统地研究俄国教育现状。1923年晨报社出版《游俄见闻纪实》,指出俄国社会主义的教育精神“自然是以输入共产主义的思想为主……需使他为社会谋幸福,这是他们的教育宗旨。”^[8]1924年出版的《苏维埃俄罗斯》一书,介绍俄国革命后政府尤其重视教育,“使信仰共产主义。”^[9]除此之外还有《将来之妇女》(1925,上海书店)、《苏俄新教育》(1929,北新书局)等等。早期共产党人也积极投身于社会实践,真正地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性的科学理论,边学习边运用,在工人群众中开展革命教育实践,以图彻底改变国家面貌。1921年,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决议》指出“学校的基本方针是提高工人的觉悟”,即动员广大劳动工人参加革命运动。1922年中国共产党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明确提出实行教育普及制度。刘少奇等人还在安源举办工人夜校,组织“路矿工人补习学校”。1924年,毛泽东在韶山开办工人夜校,组织工人白天正常工作,夜间学习知识。1924年1月,恽代英在《革命运动中的教育问题》一文中深刻阐释了教育与政治的关系,指出“不是教育了一切的人,才可以改造环境;是改造了环境,才可以有好教育。”^[10]随后,平民女学、安源党校、海丰农民运动讲习所等学校相继开办,工人教育、农民教育、干部教育等在中国大地以星火燎原之势不断发展。

三、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在我国早期传播历程的特点

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在我国的早期传播是在反帝反封建的时代任务下进行的,是马克思主义在我国传播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推动力量。早在辛亥革命前后,我国就在译介日本文献时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随后又从世界教育史的梳理中触及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的理论要点,但直到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之后才真正意义上具备了广泛传播的理论基础和思想准备。这使得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的早期研究与传播呈现出与作为整体的马克思主义传播所不同的阶段性不平衡特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多元传播路径与错失发展机遇并存。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在我国的早期传播至少存在四条推进路径:日本社会主义文献的翻译与传播、世界教育史研究文献的翻译与传播、工读主义教育思潮的传播与实践、苏俄教育政策的研究与传播。特别是20世纪初,译介日本社会主义文献以及世界教育史书籍之时,在

论及英国、德国教育史时就对马克思教育思想内容进行过简单的介绍。这些书籍虽然在当时主要是被用作师范类课程教学讲义,甚至存在对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的错误理解,但客观上的确是我国接触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的一条不同于马克思主义整体传播的独特途径。但是教育思想的早期传播也在错失过两次发展机遇:一是新文化运动时期教育领域兴起了实用主义之风,二是五四运动后重点研究和传播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教育思想的研究并非当务之急。直到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早期共产党人和教育领域学者才开启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本土化研究与实践。

其二,思想传播广泛性和教育实践有限性并存。这一方面表现为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研究获得了更为有利的环境,逐渐走向系统化、中国化的方向。但是为了尽快争取工农群众,因而在实践上更加侧重于工农群众教育和干部教育,强调文化教育为革命战争与阶级斗争服务。另一方面则表现为国共两党在不同的教育宗旨下实行不同的教育方针,使得不断深入的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的研究传播和实践范围受到了一定的制约。1927年11月,毛泽东在井冈山创办了红军的第一个教导大队,开启了革命根据地教育实践的先河。国民政府则致力于各级各类教育行政改革和制度优化。1928年,国民政府制定了《整理中华民国学校系统统案》,旨在教育方面进行了一些改革和尝试,但这些努力并未能从根本上改变教育的落后状况,甚至逐渐陷入权威主义的泥潭之中。

四、结语

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在我国的早期传播使得先进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和内容的了解更为系统,为我国教育向何处去指明了方向,是确立党的教育方针和策略的坚实理论基础。此外,从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传入中国到真正将其作为解决中国现实问题的理论武器之间存在一个短暂的时间差,这个时间差即是思想界逐渐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过程。尤其是在参与和反思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思想界论战之后才逐渐强化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分析社会问题的正确立场,极大地推动了教育学诸多分支如教育哲学、教育社会学的研究。因此,探寻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在我国的早期传播历程,对于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引领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逻辑起点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参考文献:

- [1] 黄济.中国近代教育风云——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J].教育研究,1998(5):3-5.
- [2] 梁启超.中国历史上革命之研究[J].新民丛

- 报,1903(46-48):115.
- [3] 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 上册[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195.
- [4] 郑杭生.社会学对象问题新探[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5:224.
- [5] 仲玉花.20世纪初《共产党宣言》在中国的翻译与传播——基于国际视野的考证研究[J].长春师范大学学报,2022,41(1):99-104.
- [6] 韦以黼.教育史[M].中国图书公司.1907:118-120.
- [7] 李步青.新制教育史[M].中华书局.1917:67.
- [8] 晨报社编.游俄见闻纪实[M].晨报社,1923:57.
- [9] 苏维埃俄罗斯[M].商务印书馆,1924:55.
- [10] 恽代英文集(第六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86-87.